



JLWE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JLWE*, Vol. 2, No. 1, 2025, pp.73-82.

Print ISSN: 3078-8129; Online ISSN: 3104-507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w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60108dgfic>



## 尊严的枪响：《晚安，妈妈》中的女性身份建构与伦理困境

陈雅玲 (Chen Yaling), 张连桥 (Zhang Lianqiao)

**摘要：**《晚安，妈妈》是美国剧作家玛莎·诺曼的代表作，自1979年百老汇首演以来，就以极简舞台设置和深邃思想性成为20世纪女性主义戏剧经典。围绕《晚安，妈妈》展开研究，聚焦女性身份建构与伦理困境。在女性身份建构层面，剖析社会角色规训致使的身份异化、自我认知里的矛盾挣扎；伦理困境呈现上，探讨生命伦理、家庭伦理与性别伦理方面的困境。深入挖掘女性身份建构对伦理困境的影响，及伦理困境对身份建构的规约，借剧本洞察女性在复杂社会、家庭语境下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冲突。

**关键词：**《晚安，妈妈》；玛莎·诺曼；女性身份建构；伦理困境

**作者简介：**陈雅玲，广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跨文化研究。电邮：1164736833@qq.com。张连桥（通讯作者），博士，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广州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创新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跨文化交流。电邮：504078138@qq.com。

**Title:** The Dignified Gunshot: Femal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Ethical Dilemma in *'night, Mother*

**Abstract:** *'night, Mother*, as the seminal work of American playwright Marsha Norman, has established its canonical status in 20th-century feminist theatre through minimalist staging and profound philosophical depth since its 1979 Broadway premiere. This study centers on *'night, Mother* to investigate femal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ethical quandaries. Within the dimension of female identity formation, the study dissects ontological alienation induced by societal role

discipline alongside epistemological tensions within self-cognition. Within the presentation of ethical quandaries, it explores quandaries concerning bioethics, family ethics, and gender ethics. the research further excavates the impact of female identity formation on ethical quandaries and the reciprocal impact of ethical quandaries on female identity formation, thereby illuminating women's existential states and psychological conflicts within complex social and familial contexts.

**Keywords:** *'night, Mother*; Marsha Norman; Female Identity Formation; Ethical Quandaries

**Author Biographies:** **Chen Yaling**, a Master's Candidate in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Cross-Cultural Studies. E-mail: 1164736833@qq.com. **Zhang Lianqiao** (Corresponding Author), PhD, is Professor, PhD Student Supervisor, Postdoctoral Supervisor,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Open and Innov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E-mail: 504078138@qq.com.

## 引言

玛莎·诺曼 (Marsha Norman, 1947-) 的《晚安, 妈妈》(*'night, Mother*) 是一场生命的告别, 在当代美国戏剧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迹。这部作品讨论家庭关系和存在主义哲学, 斩获 1982 年苏珊·史密斯·布莱克本奖、1983 年普利策戏剧奖, 是百老汇保留剧目。当代戏剧批评家珍妮·布朗 (J.Brown) 称赞诺曼“或许是当今美国从事严肃女性主义戏剧创作最为成功的作家”(蔡佳露、贺安芳, 2018, p.3)。“诺曼通常将其剧作设定在一个单独封闭的房间或者房子内, 同时写实风格的布景、平常的 (有时为下层社会) 角色、其中所呈现的日常生活图景以及适用的日常语言, 勾勒出一个容易辨识的现实社会环境。”(陈莉莎, 2009, p.117) 剧情在一栋美国乡村房屋内展开, 仅有的两位角色, 母亲塞尔玛与女儿杰茜上演一场死亡倒计时。杰茜告知母亲她将用父亲的手枪自杀后, 剧情在塞尔玛震惊劝阻到情感崩溃、杰茜冷静整理后事的冲突中推进。于观众而言, 终极悬念是死亡是否发生, 于剧作家和研究者而言, 更重要的是, 该剧如何通过母女二人道德对话, 层层剥开当代女性个体的生存困境。

女儿杰茜的生活充满烦恼: 癫痫缠身、婚姻破裂、儿子犯罪, 而母亲塞尔玛作为典型的妥协者, 以“等待”麻痹生活中的痛苦, 始终未能理解女儿的绝望。“诺曼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 她的作品关注弱者的另类生存状态, 也就是‘不曾被注意到的小人物’的痛苦生活, 关注这些人的意义在于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所有的生命都应该被关注、被珍惜。”(朱姝, 2008, p.95) 这部剧作从女性生活体验出发, 通过母女对话, 揭示了当代女性在身份建构过程和伦理困境中的内心挣扎。杰茜用父亲的手枪解脱自己, 剧作家诺曼实际上是想通过女性身体的自主选择, 挑战性别规范下“生存责任”的伦理束缚。作品的台词渗透着对存在主义哲学与女性觉醒的思考。这部剧作在戏剧史的地位, 绝不是依赖奖项包装, 是因为直击灵魂的对话和对家庭关系隐秘创伤的赤裸呈现。剧中生活化对白打破传统宏大叙事, 让观众在厨房、起居室这些日常场景中, 思考生存命题。

## 一、《晚安，妈妈》中的女性身份建构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身份从来源上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生俱来的，如血缘所决定的血亲的身份。一种是后天获取的，如丈夫和妻子的身份”。（聂珍钊，2014，p.263）萨特认为，自由和责任是人之为人的两个必要和绝对条件。在《晚安，妈妈》中，女儿、妻子、母亲，无论哪个身份，杰茜都有照顾者的伦理责任。剧中整理杂物的日常细节，是社会规训在家庭场景的微观体现，那些被归为女性天职的行为，实际上是看不见的精神枷锁。传统婚姻模式将杰茜定义为稳定家庭的维系者，可丈夫的冷漠和儿子的堕落，让她期待落空，形成反差。当社会用贤妻良母的标准衡量她的价值时，她的“失败”恰恰说明这种角色预设的不合理。她平静地做着家务，重复擦拭器皿、换垃圾袋的机械动作，象征着自我意识在生活琐碎中慢慢流失。社会对她癫痫病症的隐性偏见，给她贴上异样的标签，让她主动疏离了职业场域与公共空间的社交参与，自主选择收缩至家庭这一封闭空间，结果却陷入家庭和社会双重放逐的困境。这种自我封闭本质上是女性对不符合社会期待的生存压力作出的主动回避，可见规训体系下，女性为维系自我认同，将生活场域收缩至家庭内部的无奈选择，这正体现社会规范对性别身份的深刻塑造。

### （一）社会角色规训下的身份异化

在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和规范下，女性的身份建构往往与她们追求个人尊严和自我实现的渴望发生冲突。杰茜的悲剧命运就源于她的各种身份，聂珍钊谈到：“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聂珍钊，2014，p.263）《晚安，妈妈》将社会规训对个体的压迫、个体寻求存在本真的挣扎，浓缩在厨房与客厅的有限空间。

可以说，杰茜的悲剧源于角色期待与现实自我的断裂。塞尔玛对生活的理解、对事物的回应方式，带着时代与性别规训的烙印；杰茜试图挣脱，却难以完全剥离成长中被影响的部分。面对杰茜的自杀决定，塞尔玛本能地以母亲身份劝阻，作为母亲，要守护孩子，维系家庭完整，而杰茜坚持自我意志，不再被母亲期待绑架。杰茜在女儿、妻子、母亲等多重预设角色中失去自我本真，最终走向生存意义的彻底崩塌。

杰茜整理遗物时的冷静与谈论死亡时的坦然，实则是对身份异化的反抗。这种身份异化并非单一维度的压迫，而是家庭、婚姻、社会等维度的规训机制，逐步将个体的主体性蚕食殆尽。社会用婚姻成败、子女管教效果等外部标准定义她的价值，层层叠叠的角色标签，将人异化为符合规范的标准件，当个体无法承受这种异化时，唯一解法可能是生命的终结。

杰茜将人生比作坐车，她说：“我什么时候想下就下，只要坐够了，那就是到站了。我现在已经坐够了。”<sup>①</sup>母亲塞尔玛则将生活视为各种琐事的合集，已经被规训到麻木状态了：“你可以猜猜谜，整整花园，清清阁楼，要么逛逛商店”，两代人对生命的不同理解，使她们虽然站在彼此身边，却像隔着银河。“故事的主要人物是两个女人，男性在这里是缺席的；其次，两个女人的关系的实质是母女之间意志的冲突，人类原本最亲密的关系在这里被异化。”（刘秀玉，2008，p.59）在这部作品中，剧作家“成功有效地使用了舞台之外的人物形象，所有的男性人物，如主人公的父亲、丈夫、兄长和儿子都被安排在舞台之外，上场的人物被缩减为母女二人。”（岑玮，2010，p.96）剧中男性角色的集体缺席（父亲、丈夫、儿子），使得杰茜被迫承担多重角色：既要履行被规定的女性义务，又要填补男性缺席留下的责任空白，这使她陷入“必须强大却无法如想象般强大”的悖论。“杰茜的迷惑和孤独是荒谬境遇里现代人生存状态及精神世界的缩影，面对丧失自我这样的难题，杰茜无法改变而选择了死亡。”（蔡晓燕，2008，p.47）杰茜的选择最终指向对存在真实性的思索：社会用无数角

<sup>①</sup>凡引自玛莎·诺曼《晚安，妈妈》中的内容，均出自：Marsha Norman(1998-01): 'night, Mother. Dramatist's Play Service, 1998年1月。ISBN: 9780822208211, 原作为英文，引用处中文为本文作者自译，不另作注。

色标签定义人时，个体还有剥离所有附加属性、直面本真自我的可能吗？这一质问直指当代人的普遍困境，引导观众思考：我们是否也在无形的规训中，被动地成为了角色的奴隶？

## （二）自我认知的矛盾与挣扎

剧中虽未直接写明杰茜的职业梦想，却隐隐透露出曾试图掌控生活、定义自我的女性轮廓，可惜早在癫痫病、失败婚姻的挤压下，变得模糊。女性在自我认知与社会期望间经历矛盾和挣扎，这种内心斗争常威胁到她们的尊严感和自我价值的确认。杰茜的认知被长期以来扭曲的生活观念左右，她说：“我这辈子什么也干不了。”这一自我贬低的背后，是社会没给她施展能力的空间，她在社会上找不到立足之地，自我认知出现矛盾与挣扎。给母亲煮热巧克力时，她下意识地表现得温顺体贴，这是社会教给她的女儿该有的样子；可当她谈论自杀时，又完全打破了这种规则，宣告要按自己的意愿活或死。

一般来说，自杀常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但杰茜偏要用这种方式反抗，她说“我坐够了”，意思是“我不想再演了”。母亲那种用生活琐事拼凑起来的活法，在她眼里就是对现实的妥协和假装，她做出了伦理选择。她选择结束生命，不再当顺从者。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人类的生物性选择与伦理选择是两种本质不同的选择，前者是人的形式的选择，后者是人的本质的选择。”（聂珍钊，2014，p.35）杰茜清晰地感知到，外界定义的身份与自我认知的割裂。婚姻失败、儿子教育问题，她不愿意再用社会期待的“完美女性角色”的标签绑架自己。自杀这一伦理选择，是杰茜试图确认自我存在的极端方式。

存在主义是解读这一剧本的有力工具，“存在主义之所以能够被广泛接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关注的核心问题不是抽象真理或者说先验准则，而是作为个体的主观实在”（聂珍钊、王松林，2020，p.183）杰茜冷静规划死亡，平静地整理物品，给母亲订购牛奶，向母亲明确表示自己将要自杀，“我要自杀，妈妈。再过两个小时”，以主动终结生命的行为，宣示对自我的掌控权，在生死抉择上的自主性，是她对自己生命拥有主导权的表达。面对母亲的劝阻，她始终没有动摇，没有想过放弃自杀，还是以决绝的方式，完成这场关于自我认知的思考，冷静且坚决地安排着自己离世前的种种事宜，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最后几件事，掌控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就像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比尔·德马斯特教授所说的，“戏剧提倡的并不是自杀这一行为，而是意识自主性。”（刘海平、朱雪峰，2004，p.485）“晚安，妈妈”，是杰茜以自杀者的主体身份说的话，于她而言，社会的女儿、妻子、母亲这些标签，都说不清楚“我到底是谁”，只有自己主动结束生命，才是对自身存在的确认。

## 二、《晚安，妈妈》中的伦理困境呈现

“伦理困境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聂珍钊，2014，p.258）可从生命伦理困境、家庭伦理困境和性别伦理困境三个层面，对该剧进行剖析。生命伦理困境侧重于个体生命自主权与传统生命神圣观念间的冲突，探讨当疾病或创伤消解生存意义时，生存或自杀行为的价值。家庭伦理困境是从家庭视角出发，分析代际情感联系、家庭责任和个体自主选择间的关系，揭示亲密关系理解和控制的边界。性别伦理困境常关注性别权力结构等方面的问题，探讨性别因素如何影响个体的自主性、选择权和伦理道德判断。“在玛莎·诺曼的戏剧世界中，现实对她的女主角总是不公平和残酷的。她们被牢牢地困在社会或家庭的困境之中。”（石坚，1998，p.134）深入解析该剧中这三类伦理困境，有助于反思当代社会中的伦理问题。

### （一）生命伦理困境

传统伦理常把自杀视为对生命不负责，认为这违背人对家庭、社会的义务，但杰茜的逻辑是，如果活着本身就是无法缓解的痛苦，个体有没有决定生命的自主权？她在阁楼寻找父亲手枪、冷静擦拭的细节，表明这不是一时冲动逃避，而是经过思考后的决定。

杰茜在剧中反复整理冰箱、罗列购物清单、交代家务细节，这些整理行为是她在彻底离开前，“自我存在”的最后一次彰显。她坚持把糖果罐按口味分类、将旧毛巾和垃圾袋归置整齐，以物品有序模拟生命有序，用控制外物的仪式感，为死亡赋予主动选择的意义，而非被动接受。她知道自杀是对生命的否定，却主动规划死后的细节，安排母亲要做什么，将被动的死亡转化为主动的选择。杰茜说：“死亡是黑夜，是安静。”“我要安静得自己都感觉不出安静了。我要没有人能找到我。甚至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这样我就平安了。”她将死亡视为解脱现实痛苦的方式，核心是通过终结生命来逃离“存在的煎熬”。当个体被疾病、家庭、社会等多重力量挤压至“存在无意义”的绝境时，自杀是否是唯一的“自由选择”？她整理完物品后平静擦枪的细节，正是内心矛盾的具象化——毁灭与掌控、绝望与自主，最终她选择自杀作为“存在过”的终极证明，当个体找不到“活着的意义”时，主动选择死亡或许是唯一可以掌控的自由。

杰茜谈及自杀计划获取子弹的经过时，透露了兄弟道森“以为我对子弹感兴趣”，她对道森说担心有小偷，道森便热心地告知她购买子弹的途径，还帮忙联系商家送子弹上门，这反映了她的孤独与被误解，无法得到真正的理解与关注。道森以为她是“对事物感兴趣了”，想与她多交流，却全然不知杰茜内心的绝望和孤立无援。杰茜的抉择最终指向生命伦理的核心命题：伦理的本质究竟是维持“活着”的状态，还是尊重个体对“如何有意义地活着”的价值判断？她整理物品、对他人进行最后交代，以毁灭生命的方式，践行着扭曲的“责任”，在终结责任前最后一次承担责任，以否定生命的方式确认自我存在。这反映了当代人在生命伦理上的困境：当疾病和创伤耗尽生命意义的时候，杰茜的自杀不是不爱惜生命，而是在抗议这种没有意义的活法。如果活着不能让人有尊严、有价值，人在社会角色的束缚下失去了自我，那么传统观念里“生命神圣”的说法，反而成了束缚人的枷锁？真正的生命伦理，不应只强调“人必须活着”，而应先创造出让人觉得“活着有意义”的社会环境。

### （二）家庭伦理困境

杰茜自杀决定深刻揭示家庭伦理中个体和家庭间的复杂矛盾，还有家庭伦理责任和个人需求发生冲突引发的悲剧。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人和人间的伦理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意味着相互承担的伦理责任，也意味着对彼此的理解、同情和包容。”（聂珍钊、王松林，2020，p.238）杰茜的决定是对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反抗，家庭伦理核心观念就是牺牲和责任，但杰茜的内心需求未曾得到真正理解和尊重，自杀是反抗，以极端手段表达自我身份和自由。

代沟加剧了母女关系的紧张，双方的沟通存在错位，母亲塞尔玛在对话中不断尝试弥补自身的不足，但她并没有真正理解杰茜的深层次需求，反而让她感到更压抑和不被理解。塞尔玛叮嘱杰茜家里饼干快没了、蛋糕也需购置，透露出她对家庭日常琐事的上心，希望家庭生活稳定宁静；谈及杰茜的癫痫病情时，塞尔玛的关心展露无遗，她向杰茜描述其发病时的状态：冰冷的手、呕吐的口水、苍白的面容……时刻关注着女儿身体状况的每一个细微变化。但是，塞尔玛这些关心行为，在杰茜眼中却逐渐变了味，塞尔玛过度关注家中物品储备、对多方面掌控家中事务，极大压缩杰茜的私人空间。杰茜的生活被严格规范，没有自主安排生活的权利。杰茜想有更多生活主导权，但塞尔

玛事无巨细的关心方式，和杰茜背道而驰，母女二人产生巨大认知鸿沟，引发矛盾冲突。杰茜痛苦不是因为母亲无情，是因为母亲压制她的生活主导权，缺乏对她真实感受的理解。

真正的家庭责任，要建立在尊重个体自主权和自由的基础上，要允许每个成员有成长空间和自由，有效沟通，相互支持。《晚安，妈妈》展现了家庭伦理的冲突和困境，深刻探讨个体自主和家庭责任间的微妙平衡，旨在提醒观众在追求家庭责任时，也要关注家庭成员间的理解、沟通和支持，避免无法挽回的伤害。

### （三）性别伦理困境

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女性常被赋予顺从和牺牲的角色，这是因为社会长期以来的性别不平等和对女性价值的狭隘定义。“杰茜面临的困境是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建立独立身份时难以回避的。”（黄姗姗，2009，p.125）“‘父权’作为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系统性权力结构，通过家庭、教育、媒体等社会场域，将‘男性主导—女性从属’的性别秩序制度化，既赋予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权，又通过标准化的价值体系，如‘淑女规范’‘女性天职’‘女神化’等符号化倾向实现对女性的驯化，而这种驯化的实现，离不开‘规训权力’这一关键机制。”（黄思涵、张连桥，2025，p.265）杰茜婚姻的破裂，深刻暴露出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社会往往将女性的价值与婚姻挂钩，婚姻失败使杰茜内心产生自我怀疑与痛苦，来自外界和内心的双重压力，使她对生活产生了深深的绝望。

杰茜自杀的选择不是一般的选择，而是两难选择。“伦理两难是难以做出选择的，一旦做出选择就往往导致悲剧。”（聂珍钊，2014，p.268）按照传统道德观念，自杀被视为逃避责任、不符合女性坚韧和奉献精神的行为。然而，杰茜在经历了病痛、婚姻破裂、儿子入狱等种种打击后，她的生活已毫无意义，自杀是她找到的唯一一个控制自己命运的方法，既然遵循社会规则无法找到自我，那打破规则甚至结束生命，便成了她唯一的反抗途径。杰茜选择使用父亲的手枪自杀，以暴力的方式打破“女性死亡应温柔消逝”的传统叙事，宣告了对自己身体自主权的最终掌控。杰茜自杀后，塞尔玛“拿起煮巧克力的锅，带着它一起来到电话旁”，即便面对女儿的死亡，她依然无法摆脱厨房这一女性身份的象征，陷入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中。作为上一代女性，她的生活被无数琐事填满，早已习惯了顺从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主体性丧失的母亲无法为女儿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也不能为女儿创造一个适宜生存的空间。”（贺安芳，2013，p.35）“母亲西尔玛并不是一个愚钝的女人，对生活她有宿命的信念，一切都听天由命。”（朱姝，2008，p.96）她坚持说“还可能发生什么事，能改变一切的事”，塞尔玛的生活状态就是等待，在无聊中等待、在琐碎的小事中等待，无尽等待……她把自己限于“贤妻良母”的传统框架中，面对女儿杰茜的困境，也只是从传统角度去劝解，没有真正理解杰茜内心的痛苦与渴望。塞尔玛无法突破社会长期以来对女性角色的单一定义，没有过“女性是独立个体”的意识，自然也不知道怎么面对女儿杰茜作为独立个体的需求。

根据女性主义地理学的观点，“男性占据市场、办公场所等公共空间，而女性则被划归到家庭、花园等私人空间。”（黎林，2018，p.128）剧中的空间象征也充满性别伦理的隐喻：厨房和客厅是塞尔玛的“权力空间”，正是女性被局限的传统生活空间，“不仅构建了塞尔玛的身份，塞尔玛本人也通过自己的行为不断巩固空间固有的压迫性。”（黎林，2018，p.130）；杰茜的卧室则是她的“私密领域”，在这里，她只属于自己，锁上门自尽的举动是对卧室以外的性别空间的反抗；而藏有父亲手枪的阁楼，作为“家庭的边缘地带”，暗示男性权力尽管隐匿，但仍在家庭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杰茜的父亲虽然未曾出现在剧中，但他留下的手枪成为杰茜自杀的工具，这一细节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即便父亲离开后不再参与家庭生活，但他的影响力深深嵌入家庭生活的每个角落，甚至影响着家中女性的命运。“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和写实的女性生活经验之下，隐藏着作者独具匠心的叛逆性，这也是女性主义剧作家的共性之一。”（刘秀玉，2008，p.59）父亲、丈夫、儿子，这些未登场的男性角色，也是操纵剧中女性命运的隐形枷锁。《晚安妈妈》中的性别伦理困境，本质上反映了当代女性在传统角色与个人意识间的拉扯。杰茜的枪声打破了“好女儿”、“好妻子”的性别神话，塞尔玛直到最后还“低头看锅，紧紧地攥住它，犹如这是她的生命线”，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思考，女性解放不仅需要打破外在制度的桎梏，也需要解构内心的性别规范。

### 三、女性身份建构与伦理困境的互动机制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将社会中的各类人群进行区分，并将自己所属的群体视为“我群”。个体将自己归属于某群体，并对该群体产生认同。（聂文娟，2011，p.89）在《晚安妈妈》中，杰茜渴望独立与自我实现，在“反抗规范无法满足母亲的期待”与“顺从规范会失去自我”的伦理困境间挣扎。杰茜最终选择自尽，实际上是想摆脱这些身份，跳出困境。身份建构和伦理困境的互动，时刻发生在和杰茜有一样处境的女性们的身上。

#### （一）社会身份对伦理困境的影响

“社会身份的性质是伦理的性质，社会身份也就是伦理身份。”（聂珍钊，2014，p.264）在《晚安，妈妈》的故事里，杰茜的人生犹如被命运之手反复揉搓的纸团，身上背负着多重难以卸下的身份重担，她的各种社会身份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将她紧紧笼罩在复杂的伦理困境中。聂珍钊教授认为，“伦理身份是道德行为及道德规范的前提，并对道德行为主体产生约束。”（聂珍钊，2014，p.264）家庭中，母亲塞尔玛对女儿杰茜寄予厚望，期待她安稳遵循传统女性生活轨迹，相夫教子、和睦持家。儿子的入狱使作为母亲的她陷入深深自责。这些不同身份带来的失败感，让她在亲情关系中陷入了无尽愧疚和痛苦。婚姻中，传统婚姻模式要求女性以丈夫为中心，将家庭视为生活全部重心，这些外界评判，引发了她内心深处强烈的自我否定。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杰茜长期受癫痫病折磨，精力和体力都远不如常人，难以在事业实现自我价值。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只有意识到其他道德主体的需要和欲求时，自由的价值才能被更深切地感受到。”（聂珍钊、王松林，2020，p.233）杰茜在痛苦的思考中不断挣扎，无所适从。杰茜产生严重的身份认知偏差，在婚姻失败、儿子入狱等一系列问题中过度放大自身责任，忽视社会环境对婚姻观念的影响、家庭结构中其他成员的作用等外部因素。她陷入自我否定的深渊，认为自己毫无价值，引发她对生命意义的质疑。她无法在现有身份中找到存在的意义，选择以自杀这一极端的方式寻求解脱。实际上，杰茜作为女儿，对母亲的情感和责任认知存在偏差。她内心深处渴望得到母亲的理解，可在与母亲的相处时，又不彻底讲明，让母亲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这种矛盾心理，使她在处理与母亲的关系时，既依赖母亲的关爱，又对母亲的不理解产生抗拒。杰茜的经历是令人痛心的悲剧，揭示当代社会女性身份建构的过程，以及引发的身份认知偏差对个人判断和选择有多么大的影响，引导观众思考社会对女性身份的定位、价值评判和伦理观念。

#### （二）伦理困境对身份建构的规约

在《晚安，妈妈》紧凑而压抑的叙事里，杰茜人生中的多重伦理困境将她层层围困，如同不断收紧的绳索，勒住了她。“情感是人与客观物质世界的媒介，直观情感和“不可名状的情感”共同构成了主体行动的依据，但后者随时可将主体抛入失控状态”（郭然，2025，p.137），杰茜身份建构的

空间充斥着家庭内部的情感关系和各种责任关系，这些伦理困境对她的身份建构有着显著的规约。

首先，癫痫带来的病痛折磨着杰茜的身体，还影响了她的社会交往和心理状态。社会期待女性独立能干，可她连维持正常生活都困难重重，杰茜的癫痫症是她的困境，但这个病已经成为她的最大特征，限制她的各项行为。无法正常参与社会工作，使她感到自己是一个不完整的人，无法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其次，杰茜与母亲塞尔玛的关系也是她时时刻刻必须面对的处境。塞尔玛对杰茜的生活进行了广泛的干预，从日常生活的小事，到对杰茜人生的规划，使杰茜无法全身心地追求自我独立和自主，还需要背负着来自母亲塞尔玛的沉重情感负担和道德责任。杰茜与母亲塞尔玛间的关系确实已经失去平衡，这种失衡深刻地影响了杰茜的身份认同与建构，并推动她走向自杀的悲剧性结局。再者，杰茜与前夫赛希尔的关系也是理解杰茜的行为的重要情感线索，他们的关系对杰茜的身份建构也有所规约。尽管赛希尔已经离开，但他对杰茜的影响仍然存在。听到母亲说赛希尔另找了个姑娘时，杰茜沉默了，这沉默可能包含了失落、背叛感、对过去关系的怀念，或者对未来的不确定。她的健康状况、家庭关系和过去的婚姻都对她的自我认知和自我价值感产生影响，这些伦理困境如潮水般一次次冲击着杰茜，最终导致她采取极端行动。她也想继续做一个让母亲骄傲的女儿、维持好家庭的妻子和母亲，但内心对自由和自我价值的渴望又无比强烈。社会要求女性默默忍受痛苦、以家庭为重，可她实在无法在这样的框架里获得真正的满足，对自己存在价值的根本性质疑如影随形，身份认同的危机也越来越严重。

女性在伦理困境中进行身份重构，面临着太多难以克服的阻碍，社会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观念，是横亘在前面的一座大山。杰茜的自杀行为是对现有身份的反抗，用结束生命这样决绝的方式，摆脱传统伦理强加给自己的角色枷锁。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审美不是文学的属性，而是文学的功能，是文学功利实现的媒介。……任何文学作品都带有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就是教诲。”（聂珍钊，2010，p.17）所以，文学作品用角色选择推动情节发展，承载作者的情感表达，实现作品教诲意义。剧作家诺曼“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来解放女性身上的束缚，挑战男权中心的社会，表现了对社会底层女性的人文关怀。”（徐瀛，2021，p.59）英国戏剧理论家、教授 J. L. 斯泰恩认为，“戏剧的意义不可能只存在于文字中，而存在于声音和语调中，存在于说话的节奏和沉默中；此外，还存在于演员的姿态和表情中，他与其他演员之间身体上的区别，悲剧的凝重和喜剧的生动，以及微妙的文体风格。在舞台上太多不同的元素在同时创造意义，以至于用其自身以外的术语来识别它是不恰当的。经验就是意义。”（J. L. Styan, 1975, p.27）戏剧的意义通过观众的体验展现出来，随着剧情发展，观众感受到杰茜的绝望痛苦。那声尊严的枪响穿透四十多年的时空，至今仍在拷问每个观众，这个世界是否有给予女性足够的理由和空间在人生路上前行？

综上，《晚安，妈妈》中杰茜因传统性别角色重压走向悲剧，失败婚姻、儿子犯罪、令母亲失望，加上癫痫疾病缠身，都是对她的桎梏。杰茜的经历，是无数处于伦理困境中女性的缩影，她的故事展现女性在试图重构身份时面临的艰难处境。这部戏剧警示人们重新思考人该如何活着、存在的意义这些永恒命题，思考如何构建更包容的伦理体系，从教育、职场和家庭等多维度入手关注女性困境，让女性能够不再被传统观念所困，自由地探索和发展属于自己的身份及人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来中外戏剧交流史文献整理研究”（22&ZD28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ORCID

**Chen Yaling**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5-4456-1322>

**Zhang Lianqiao** <sup>ID</sup> <http://orcid.org/0000-0003-1199-4840>

## References

- 蔡佳露、贺安芳 (2018): “《晚安, 母亲》中的母亲身份研究”, 《大众文艺》(21): 3-4。
- [Cai Jialu, He Anfang (2018). “A Study of Motherhood in 'night, Mother”,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21): 3-4. DOI: <https://doi.org/10.20112/j.cnki.issn1007-5828.2018.21.004>]
- 蔡晓燕 (2008): “从杰茜的选择看存在的困境——解读玛莎·诺曼的《晚安, 妈妈》”, 《戏剧文学》(06): 46-49。
- [Cai Xiaoyan (2008). “The Existential Dilemma Reflected in Jessie's Choice: An Interpretation of Marsha Norman's 'night, Mother”, *Dramatic Literature* (06): 46-49. DOI: <https://doi.org/10.14043/j.cnki.xjwx.2008.06.001>]
- 岑玮 (2010): “舞台魅影: 玛莎·诺曼剧作中不在场的男性形象”, 《四川戏剧》(03): 95-97。
- [Cen Wei (2010). “Stage Phantoms: The Absent Male Images in Marsha Norman's Plays”, *Sichuan Drama* (03): 95-97.]
- 陈莉莎 (2009): “玛莎·诺曼研究述评”, 《新西部》(06): 117-118+120。
- [Chen Lisha (2009). “A Review of Marsha Norman Studies”, *New Western* (06): 117-118+120.]
- 郭然 (2025): “现代小说的传播: 情感叙事与公私领域的协商——评金雯《情感时代: 18 世纪西方启蒙思想与现代小说的兴起》”, 《文艺国际传播研究》(01): 135-141。
- [Guo Ran (2025). “The Dissemination of Modern Novel: Affective Narratives and the Negotia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A Review of Jin Wen's *Age of Feeling: Enlightenment Thoughts an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Novel in the 18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01): 135-141.]
- 贺安芳 (2013): “母女关系视角下的玛莎·诺曼作品研究”,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03): 32-36。
- [He Anfang (2013). “A Study of Marsha Norman's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 (Liberal Arts Edition)* (03): 32-36.]
- 黄姗姗 (2009): “从杰茜的结局看女性主体建构的困境——玛莎·诺曼《晚安,妈妈》的悲剧性解读”, 《电影文学》(23): 124-125。
- [Huang Shanshan (2009). “The Dilemma of Female Subject Construction Reflected in Jessie's Fate: A Tragic Interpretation of Marsha Norman's 'night, Mother”, *Film Literature* (23): 124-125.]
- 黄思涵、张连桥 (2025): “规训、符号化与隐性共谋:《洛丽塔》中父权秩序的‘囚笼’与女性心理创伤”, 《文学写作与评价学刊》(02): 264-274。
- [Huang Sihan, Zhang Lianqiao (2025). “Discipline, Symbolization, and Implicit Complicity: The ‘Cage’ of Patriarchal Order and Female Psychological Trauma in *Lolita*”,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Vol.1, No.2, 2025: 264-274.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2.09>]
- J. L. Styan (1975). *Drama, Stage and Aud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黎林 (2018): “隔离、边缘与重塑: 女性主义地理学视域下《晚安, 妈妈》之主题再探”,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5): 127-133。
- [Li Lin (2018). “Isolation, Marginal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 Re-examination of the Themes of 'night, Mother from the

-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Geography”, *Journal of Huaqiao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05):127-133. DOI: <https://doi.org/10.16067/j.cnki.35-1049/c.2018.05.013>
- 刘海平、朱雪峰 (2004): 《英美戏剧: 作品与评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Liu Haiping & Zhu Xuefeng (2004). *British and American Drama: Plays and Criticisms*.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刘秀玉 (2008): “从《晚安,妈妈》看玛莎·诺曼的女性主义戏剧创作”,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3): 59-62。
- [Liu Xiuyu (2008). “Marsha Norman's Feminist Dramatic Cre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ight, Mother”, *Journ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03): 59-62.]
- 聂文娟 (2011): “群体情感与集体身份认同的建构”,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04): 83-95。
- [Nie Wenjuan (2011). “Group Emo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y”, *Foreign Affairs Review (Journal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04): 83-95. DOI: <https://doi.org/10.13569/j.cnki.far.2011.04.001>]
- 聂珍钊 (2010):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 《外国文学研究》(01): 12-22。
- [Nie Zhenzhao (2010).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al Theorie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2(01): 12-22. DOI: <https://doi.org/10.19915/j.cnki.flr.2010.01.003>]
- 聂珍钊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 [Nie, Zhenzhao (2014).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聂珍钊、王松林主编 (2020):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 [Nie Zhenzhao, Wang Songlin, eds. (2020). *Theoretical Studie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石坚 (1998): “论玛莎·诺曼的女主角的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 《戏剧》(04): 134-138。
- [Shi Jian (1998). “On the Real and Imaginary Worlds of Marsha Norman's Heroines”, *Drama* (04): 134-138. DOI: <https://doi.org/10.13917/j.cnki.drama.1998.04.021>]
- 徐瀛 (2021): “性别规范阴影下的新女性——玛莎·诺曼戏剧中的性别焦虑”, 《四川戏剧》(03): 55-59。
- [Xu Ying (2021). “New Women in the Shadow of Gender Norms: Gender Anxiety in Marsha Norman's Plays”, *Sichuan Drama* (03): 55-59.]
- 朱姝 (2008): “一曲安魂为重生——玛莎·诺曼在《晚安,母亲》中的创作思想”,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S2): 94-98。
- [Zhu Shu (2008). “A Requiem for Rebirth: Marsha Norman's Creative Vision in 'night, Mother”,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S2): 94-98.]